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隋唐史学思想卷

牛润珍 吴海兰 何晓涛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主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

隋唐史学思想卷

牛润珍 吴海兰 何晓涛 著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隋唐史学思想卷 / 牛润珍, 吴海兰, 何晓涛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1-07808-0

I. ①中… II. ①牛… ②吴… ③何…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
②史学思想—中国—隋唐时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890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隋唐史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SUITANG SHIXUE SIXIANG JUAN

作 者: 牛润珍 吴海兰 何晓涛

责任编辑: 郑翠云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38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808-0

定 价: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牛润珍，河北成安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方志学。出版有《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陈垣学术思想评传》《河北通史·魏晋北朝卷》《河北省志·著述志》等多部著作。

吴海兰，湖北麻城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学术史，著有《黄宗羲的经学与史学》等。

何晓涛，浙江新昌人，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思想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现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副总编辑。

◎ 责任编辑：郑翠云
◎ 美术编辑：陈培亮
王 玮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遗产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题 记

吴怀祺

隋唐时期史学思想的历史借鉴思想把对历史盛衰的总结，提高到一新的水平。

从西晋到隋亡，这 350 多年间，中国历史经历了一次大震荡。在急风暴雨之后建立起来的大唐王朝，要稳定统治、开盛世新局面，进行大规模的历史总结，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盛衰总结有了新的时代特点。

——历史总结的开阔性。唐朝作为大一统王朝，把历史总结、编修史书作为政府的行为确立下来。设立史馆大规模修史，显示其开阔的历史眼光，这是重视历史传统的新发展。

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属个人修史。司马迁、班固写史不但不为朝廷所认可，还受到打压和迫害。《宋书》之作多为补续而成，《南齐书》经过“奏请”而作，基本还是私撰之作，《魏书》算是设局编修出来的。但作为大一统王朝政府组织修史，始于唐朝。

唐初，有修梁、陈、北齐、北周、隋史之举，但未能成书。贞观三年（629 年），唐太宗设梁、陈、齐、周、隋史的编修机构，重新开修五朝史，并于贞观十年修成。贞观二十二年修《晋书》，正是六史。后来，



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朝廷批准《南史》《北史》行世。在这之前，即显庆元年，《五代史志》修成，附于《隋书》。前后不过30年，在传统史学二十四部正史中，有8部正史是在这期间修成的。史馆修史，反映出史学发展的新进程，体现了重视历史传统的新特点。史馆修史一方面是官方控制修史大权，又一方面为大规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条件。史馆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如果说，两汉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高峰，形成史学民族性的基本特征；那么，魏晋南北朝史学则是在许多方面推进了中国史学，是传统史学横广式的发展，为传统史学奠定了基本规模和格局。^[1] 在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隋唐史学的贡献在于：唐代以制度形式把史书的编修作为朝廷行为基本固定下来，“正史”的理念正式确立，重视历史的传统成为民族文化的一大特色。

——官修与私修相结合。在唐之前和唐之后，私修国史，甚至被视为违法的行为。“私史案”与相当一部分的“文字狱”，都是由私人修史导致的。

唐初所修八史，其中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带有私修的特色；《梁书》《陈书》既是官修，又有私修的因素。官修，但不排斥私修，甚至积极吸收私修史书的成果。官与私的结合，相得益彰，不但加速了修史的进度，而且使所修史书有特色，提高了史书编修的质量。

进行历史总结的，有史臣，有人君（唐太宗就曾亲自写史书的评论），还有经学家。这在后面还要提及。

——历史总结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相当大的效应。唐初修史时从历史总结出来的认识，通过君臣之间的“求谏”“进谏”与“纳谏”，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有的人臣说唐太宗如果不重视百姓生活，不注意减轻百姓负担，不重视对继位人进行教育，那太宗也就是隋炀帝。这些话相当刺耳，太宗还是压下心头不快，不但听进去，而且注意收敛自己的欲望，在政治上实施惠民政策。“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直接受益于历史，从历史经验中找到治理、振兴

[1] 参见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题记》，黄山书社2003年版。

社稷的措施。

唐朝后期，元稹说到贞观之治与一批谏臣的出现有关。他说：“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孙伏伽以小事持谏，厚赐以勉之。自是论事者唯惧言不直、谏不极，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讳为虞。于是房、杜、王、魏议可否于前，四方言得失于外，不数年大治。”^[1]元稹对本朝盛世出现的原因，做出了符合实际的总结。

历史总结有效性，至少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是找到影响历史盛衰变动的真正原因，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影响历史盛衰的原因。唐代君臣在总结中，提出不少见解，前代史家也曾提出过，但唐朝君臣对历史的总结，突出的一点是“民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唐太宗为《晋书》的《宣帝纪》写《论》，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再如，贞观二年（628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2]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尔。”^[3]要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关键是人君与直接统治百姓的刺史、县令。这就凸显和发展了《尚书》《孟子》的重民思想。

二是把历史借鉴与通变思想结合起来。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要认识到历史的经验总是发生在一定条件下，这里有“时”“势”的问题，运用这些经验教训，也有“时”“势”的问题。忽视这一基本要求，固执于历史经验，形式上重视历史的借鉴，不仅收不到成效，还可能走到相反的方向去。后世的“教条主义”与此有关。

唐朝君臣总结历史经验时，开始意识到要有“通变”的眼光，一切都与条件有关。魏徵说：“圣人举事，贵在相时，时或未可，理资通变。”^[4]《隋书》的《虞世基传》引虞氏的《讲武赋》，说：“夫玩居常者，未可论匡济之功，应变通者，然后见帝王之略。”《晋书》卷六十八

[1]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元稹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 《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4] 《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



着意记录了纪瞻对陆机说的话：“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义，救弊之术也。羲皇简朴，无为而化，后圣因承，所务或异。非贤圣之不同，世变使之然耳。”

前面提到唐太宗为《晋书》的《宣帝纪》写了《论》，太宗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这里提出了顺“理”而治的论点，已经不局限于个别经验教训的总结。虽然通变思想在他们来说，还是初步的，但这和此前的历史总结相比，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

唐朝历史的通变思想还没有充分发育起来，只有到了王夫之那里，历史通变思想才有一个大的发展，但这时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老的时期，王夫之的理性认识无法对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是“求谏”“进谏”与“纳谏”的结合。人主应当具有开阔的胸襟，倡导进谏并且真正做到纳谏。人臣还要有敢于进谏的“胆识”。历史经验总结能不能收到成效，这是一个关键。

唐朝的历史总结意识与前代相比，显然有了一个大的提高。但也要看到，作为封建君王，在纳谏上是有一定局限的。贞观后期，太宗已经不如早年那样能纳谏了，处理“边事”问题即是例证之一。封建社会君王纳谏一般总表现为“个人”行为；封建专制的制度，也无法最终解决自身产生的矛盾。

历史有没有借鉴的功能，在中外史学史上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近年来，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了。^[1]应该说，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还是个实践问题。

唐朝是历史盛衰总结思想、历史借鉴思想发展充分的时期。讨论这一问题是有价值的。

历史总结是史学思想的发展。经学大总结也影响到史学思想的发展。唐朝的历史大总结与经学大总结联系在一起。就在倡导大规模修史的同

[1] 参见吴怀祺：《历史借鉴与当代社会》，1996年第三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时，唐朝又开启了经学总结的工程。^[1] 房玄龄、颜师古、孔颖达等是大规模史书的编修者与组织者、领导者，也是经学整理的组织者、领导者。把唐朝的经学与史学联结起来看，对唐代史学思想的成就就会有更多的认识。

隋唐时期的经学，按皮锡瑞的说法，是从南北朝的经学分立时代进入到经学统一时代。隋朝的统一，是南并于北，但从学术上说是北学并入南学^[2]。但皮氏对此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种因素的变动存在差异。文化各种因素以及制度的变动又有差异。政治制度变动与文化变动、政治与文化中各种因素的变动，又有各种复杂情形。^[3] 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性。

学术文化内在的特性是长期锻铸而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学的统一和历史大总结的要求，都是民族文化内在凝聚力的体现。

经学的变化，影响到史学思想的变化，反映在隋唐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上。有唐一代的经学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唐前期，崇儒学，中经大历年间，经学发生新的变化，新学风对经学、史学都产生影

[1] 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开始大规模修史，贞观四年即开始了经学的整理与修订；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孔颖达重修，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命令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这与八史之修前后时间相当，唐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传习浸讹，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多所厘正。“既成，悉诏诸儒议，于是各执所习，共非诘师古。师古辄引晋宋旧文，随方晓答，谊据该明，出其悟表，人人叹服……帝因颁所定书于天下，学者赖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三》）“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颜师古参与《隋书》编修，是《晋书》监修之一。他在《左传》《汉书》的研究方面，尤有成就，特别是其《汉书》注，尤为人称道。时人称他为左丘明、班孟坚之忠臣。

[2]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219页。

[3] 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响。至晚唐，儒学在与佛道的碰撞中孕育了新的因素。^[1] 史学思想在唐初、中唐与晚唐是不一样的。粗略一点，以大历年间为界，把唐代史学思想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大历年间出现新的学风，“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茵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2] 大历以后，柳宗元等一批学人继续发展这样的学风。^[3]

唐代经学的学风与经史观念对史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魏晋的学术到了后期则是儒玄学合流，最后到了隋之王通，儒学发展了。唐代《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唐太宗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确定儒家经典官方注解，充实经典的内容，恢复这些经典的权威，使儒家重新取得统治思想的地位。^[4] 对《五经正义》的疏，有不同的评价，对每一《经》的整理中的长处与短处，也有不同的意见；其博杂的缺点也是事实。但从整体上看，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5]，“唐人义疏之学，虽得失互见，而瑕不掩瑜，名宗一家，实采众说，固不无附会之弊，亦足破门户之习”^[6]。

所以，隋唐时期史学思想虽思辨不足，但论盛衰、重现实的思维特点，和其时的学风却是合拍的。

儒学的笃实学风，影响到史家的史学总结，反映在对经史关系的理

[1] 《新唐书·文艺传上》的《序》说，唐代文章变化，实际也是经学变动的缘故：“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于是韩愈唱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牾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

[2] 《新唐书》卷二百《儒林传下》。

[3] 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第九章说到大历后啖助、赵匡、陆质影响深远，柳宗元至以执弟子礼于陆氏为荣。一时学风大变，“盖自大历而后，经学新说日昌，初则难疏，继而难注，既则难传。于是离传言经，所谓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矣”。大历后学术变化，又影响到以后史学思想的变化。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2页。

[5]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

[6]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8页。

解上,《隋书·经籍志》提出“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的认识,从文献产生角度说明“经籍源于史”。^[1]史学家阐释这一文献观念,体现出了唐朝尊“经”但落脚点在“史”,重“史”但着眼点在“今”。《隋志》说: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

这一段话从三个方面论说经史的关系:一,从“经籍”的根本精神上,论说了包括经书在内的所有文献与史官的关系,有史官记录,才有“经”,才有整个经籍;二,从“用”的角度,论说经的“其用无穷”,是“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这是经之用,也是史的本义;三,从文献记录、“书契”发生的角度上,说明经与史、与史官的关系。

另外,关于“正史”“古史”并重的观念,关于史籍分类及史书编纂思想特别是纪传体的编纂思想,以及关于史才论等,在《隋书·经籍志》《史通》和《五经正义》中都有新的阐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把《史通》和《隋志》《五经正义》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我们会看到当时经史之学的思想倾向。

另外,还要注意到宗教与史学思想的关系。如,道教的无为思想在唐初历史大总结中就体现出来,在提倡以人为本时加上了以清心简事为本。^[2]

[1] 见吴怀祺:《〈隋书·经籍志〉的史学观》,《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 见《新唐书》卷一百二《令狐德棻传》等。

目 录

题 记 / 1

导 言 / 1

第一节 重视历史借鉴的历史意识 / 1

一、大唐王朝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借鉴 / 1

二、历史盛衰的新总结 / 4

三、唐初八史的总结 / 10

第二节 学术思想变化与史学发展的趋向 / 11

一、从魏晋南北朝史学评论说起 / 12

二、《隋书·经籍志》的经史观与史学批评 / 17

三、《史通》的总结 / 21

四、《通典》的通识与经世思想 / 34

五、柳宗元学术思想中的哲理性 / 41

第 一 编

第一章 唐代史馆官修史书思想与史家 / 60

第一节 史馆的建立与组织 / 60

一、唐初修史机构的变化 / 60

二、唐代史馆的建立 / 62

三、唐代史馆之组织 / 67

第二节 官修史书思想与意识 / 72

一、功德不朽的历史意识与“君举必书” / 72

二、时政记的编纂思想与论争 / 76

三、唐代君臣对修史的认识 / 79

四、唐代修史思想的变化 / 83

第三节 史家群体结构与社会阶层 / 85

一、唐代史家群体的形成与演变 / 85

二、史家群体结构 / 93

三、史家群体的社会阶层 / 95

第二章 唐初八史对历史的总结 / 99

第一节 历史兴亡的探讨 / 99

一、帝王之兴，赖累功积德 / 101

二、“不有君子，何以能国” / 108

第二节 治国与守国经验的总结 / 112

一、政治体制 / 112

二、治国方略 / 118

三、民族关系 / 123

第三章 《贞观政要》的当朝史总结与历史教育思想 / 129

第一节 当朝史总结 / 131

一、“贞观之治”的成就 / 131

二、“贞观之治”下隐伏的危机 / 138

三、“贞观之治”：民本思想的突显 / 144

第二节 历史教育思想 / 147

一、“为君之道”：以史为鉴 / 148

二、“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为人臣之责 / 154

三、知百姓艰难，不可放纵：皇室子弟教育的落脚点 / 157

第三节 《贞观政要》的特色与影响 / 159

一、特色 / 159

二、影响 / 162

第四章 刘知幾的史学总结与史学思想 / 168

第一节 刘知幾的治学道路与成就 / 168

一、刘氏家族 / 168